

# 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生成的心理机制与治理对策

凌 娟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网络谣言是网络思想领域中的黑色地带,是国家文化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治理对象。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种各样的网络谣言不断,给党和政府的抗疫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干扰和挑战。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的生成和传播通常会受到网络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运用信息收集、分类、综合与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心理学角度对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生成的心理机制进行深入探究,从而找出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途径,对于凝聚人心共同抗疫、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网络谣言;社会危害;心理机制;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21)1-0021-07

## 0 引言

网络谣言是指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传播的谣言。互联网发展到 WEB2.0 时代,网站内容发布的主体从服务商转变成了网络用户。从此,网络谣言大肆泛滥,互联网把谣言带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谣言传播范围越来越广,社会破坏力越来越大。重大突发事件的出现,给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现实材料和扩散的机会。2020 年春,在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暴发后,各种各样的网络谣言不断,混淆视听,让人真假难辨。

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加重了社会恐慌情绪,使社会生活秩序遭到破坏、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给党和政府的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干扰和挑战。对重大疫情下的网络谣言进行分类,分析其生成的心理机制,探讨有效治理对策,对于团结全国、全世界人民共同抗疫,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保卫国家安全、增强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1 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的界定、类型及其社会危害性

疫情发生后,民众和媒体高度关注和重视疫情的发展态势。此次疫情中,网络成了疫情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和阵地,高峰期间一天之内就曾报道 50 多万篇(条)关于疫情的网络信息<sup>[1]</sup>。而混杂在疫情信息中的网络谣言离散民心,给党和政府的抗疫工作带来了挑战。为此,要取得抗疫的全面胜利,在抗疫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为此,首先要对重大疫情下的网络谣言进行界定、分类,并分析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

### 1.1 重大突发疫情下网络谣言的界定

谣言是人类社会较为常见的舆论现象,从本质上讲,谣言也是一种信息,法律上对其定性为“虚假信息”。有学者根据谣言的法律规定,对网络谣言的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网络谣言是网络用户发布且在网络公共传播领域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影响的未经证实的信息”<sup>[2]</sup>。但这个概念的表述还不是十分全面,没有对网络谣言的内涵进行全面囊括。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发布的关于“武汉出现 SARS”的网络信息,最初被官方认定

收稿日期:2020-12-25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0060)

作者简介:凌娟(1977—),女,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为网络谣言,相关部门也因此对李文亮医生进行了训诫。后来随着疫情的爆发,关于李文亮医生发布的网络信息是否属于网络谣言一事,引发了网民的讨论和质疑。最后,最高法院发文解释才算平息了此次舆论风暴。“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我们的确可以认定‘说武汉出现 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但是,事实证明,……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所以,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sup>[9]</sup>结合学者对网络谣言概念的界定和最高法院对此次疫情中出现的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对于网络谣言内涵的界定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应从网络信息内容方面来界定。网络信息内容是信息的核心要素,信息内容是否属实,是否具有真实性,是判断某网络信息是不是网络谣言的前提条件。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包括:信息中所指的某人或某事是否真实存在或真实发生;信息中涉及专业领域的名称表述是否准确。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在信息发布时要求其对于专业领域名称表达精准,这似乎有点高,尤其是对于重大突发疫情来讲,很多时候可能会有新的病毒产生,如果要对新型病毒进行精准描述,就必须等到病毒基因序列检测完成,而一般情况从新型病毒的出现到检测完成至少需要 2 个星期时间,这样必然会失去控制病毒扩散的最佳时机。因此,疫情暴发初期对于网络信息真实性的要求应主要集中在“信息中所指的某人或某事是否真实存在或发生”,而不应吹毛求疵地要求“专业术语的精确性”。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我们要善于抓主要矛盾。

其次,应从网络信息发布者、传播者的主观动机方面来界定。每一条网络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其背后都有特别的目的和动机。网络信息发布者、传播者的主观动机包括善意的和恶意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动机。善意的动机是指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发布和传播该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告知、提醒、教育公众远离危险或获得某种经验教训以避免失败等。恶意的动机是指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发布和传播该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攻击他人或组织,从而破坏社会秩序等。网络谣言发布和传播的动机往往是恶意的,是为了故意攻击他人或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因此,根据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的主观动机来判断某网络信息是否属于网络谣言是一条重要的判断标准。

最后,应从网络信息发布和传播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来界定。网络信息发布和传播后都会对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可分为积极的社会影响和消极的社会影响。积极的社会影响是指通过网络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给社会带来正能量,促进社会的生产和发展;消极的社会影响是指通过网络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给社会带来负能量,阻碍社会的生产和发展。网络谣言对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的影响基本上都是消极的、负面的。

综上所述,在重大疫情中,对于主观上是恶意的,没有真实发生的或没有科学依据的,并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网络信息,我们可称其为网络谣言。

## 1.2 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的类型

传播学认为,信息是由信息生产主体、信息内容、信息产生动机、信息产生的效果等要素组成。重大疫情下产生的网络谣言,根据信息的不同组成要素可划分为不同类型。从信息生产的地域来看,网络谣言可分为国外网络信息和国内网络信息;从信息生产主体来看,网络谣言可分为由媒体生产、有组织、有目的的网络谣言和由网民个体发布的网络谣言;从信息内容来看,网络谣言可分为关于疫情病例的网络谣言、关于预防病毒的网络谣言、关于生活物资方面的网络谣言、关于政府不作为的网络谣言、关于人权方面的网络谣言、关于病毒来源的网络谣言等;从信息产生的动机来看,网络谣言可分为博人眼球的网络谣言、为报复社会的网络谣言、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网络谣言等;从信息产生的影响来看,网络谣言可分为影响面较大的网络谣言、影响面一般的网络谣言。而信息内容可影响其传播效果,判断其动机。因此,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产生的网络谣言主要是以其内容为依据进行分类。

其一,关于虚构或夸大疫情的网络谣言。疫情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许多关于虚构或夸大疫情的网络谣言。如网传“今天凌晨益阳确定 1 例,传播者为武汉大学回来的学生,……已造成 790 人接触,672 人隔离,

118人还未找到,现益阳市委已发动各区县寻找。且造成益阳市中心医院血液科全科室隔离。特别注意不要接触益阳来的人”<sup>[4]</sup>等之类的疫情信息。

其二,关于预防病毒的网络谣言。疫情期间,关于预防病毒的网络谣言数量巨大,有些容易辨识,但有些很难辨其真伪。如“在疫情期间越补越好”;“饮用高度酒能抵抗新型冠状病毒”;“盐水漱口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等等。

其三,关于居民生活方面的网络谣言。疫情期间,关于居民生活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网络谣言,如1月底网传“北京超市、菜市场将关闭一周”的消息等,引发居民纷纷涌入超市抢购生鲜水果、米油、消毒用品等生活用品。

其四,关于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网络谣言。疫情期间,武汉市政府和红十字会等机关单位一直处于网络舆论风暴中心,关于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网络谣言此消彼长。如网传,今日消息称“山东寿光援助武汉350吨蔬菜,武汉市红十字会通过超市低价售卖”等之类的网络信息,引发网友高度关注和争议。

其五,关于病毒来源的网络谣言。关于此次疫情病毒的来源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开谜底。但一些心怀叵测、不怀好意的网络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不断利用病毒来源问题炮制各种阴谋论来攻击我国政府。如有美国媒体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于武汉生物实验室”,“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宣称,病毒是所谓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新型冠状病毒是因在武汉市扩建5G移动通信技术后引起的”等等。这些鼓噪背后的卑劣政治图谋昭然若揭,让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不禁感慨道:“令疫情雪上加霜的是,错误信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比冠状病毒传播的速度还要快。……很显然,阴谋论不仅偏离了科学和理性的轨道,更制造了谣言、偏见、恐慌,损害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努力。”<sup>[5]</sup>

### 1.3 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引发的社会危害

重大疫情下的网络谣言,除了关于预防病毒方面的网络谣言产生的社会危害较小以外,其他类型的网络谣言都对社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危害。概括起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重了民众的恐慌情绪,破坏社会生活秩序。疫情期间,大部分民众如惊弓之鸟,内心充满焦虑、恐惧等不良情绪。这时,虚构、夸大疫情或关于生活物资短缺等网络谣言,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加重公众的恐慌心理,使公众产生不理智行为,从而破坏社会正常生活秩序。

第二,损害政府公信力,破坏党群关系。良好的党群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宝。在疫情期间,一些别有用心心的媒体或组织、政党却不断利用疫情制造关于人权方面的网络谣言,如把临时改建的集中治疗中心污蔑为难民集中营等,制造关于国家防控不力的网络谣言、关于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网络谣言等,其用意非常明显,意在激发不明真相民众的愤怒,让民众对党和政府产生对抗情绪,想以此达到颠覆我国政权的政治野心。

第三,引发种族仇恨,损害国际关系,阻碍全球抗疫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武汉疫情暴发后,我国政府果断采取“封城”措施,为世界其他国家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可是,有些国家却自以为是、盲目自信,不重视合作,不相信科学,一意孤行,导致疫情在全世界爆发,造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最后为了逃避责任,某些国家强势“甩锅”中国,炮制“病毒是由武汉病毒所泄露”“新冠病毒是实验室设计的生化武器”等网络谣言。这种“甩锅”中国之类的网络谣言已经持续了数月,非但不能帮助各个国家有效抗击疫情,反而引发了种族仇恨,严重损害了国际友好合作关系,严重阻碍了全球抗疫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损害了其他国家为抗疫所付出的努力。

## 2 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生成的心理机制

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除了有网络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生成的心理机制包括网络谣言产生的心理动因和传播的社会心态。

### 2.1 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产生的心理动因

谣言是人们内心情绪的投射,往往是从感觉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的产生是为了满足谣言生产者的某种心理需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传播的网络谣言五花八



门,其产生的心理动机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为了刷存在感。有些内心不够自信的网民,为了刷存在感,喜欢对一些自己还只是认识一知半解的事物或知识进行宣扬,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重大疫情下关于预防病毒类的网络谣言大多属于此类情况。

第二,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和敏感问题的多发期,加上又缺乏顺畅的沟通机制,一些公众便喜欢利用重大突发事件制造网络谣言,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重大疫情下关于夸大或捏造疫情病例的网络谣言大多属于此类情况。

第三,倒逼地方政府真相。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由于传统的思维定式,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维稳的目的会有选择性地对重大突发事件信息进行报道。但网络信息时代,社会公众民主意识大大增强,大部分人不太满足遮遮掩掩的信息报道,希望政府能够将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提高公众的知情权。于是,为了倒逼地方政府做出回应而不断制造网络谣言。

第四,故意制造社会动荡。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过对我国的和平演变,重大突发事件是他们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机会。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定会借机炮制各种各样的网络谣言,扰乱人心,引起社会动荡。在本次疫情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造“新型冠状病毒是武汉生物研究所泄露的细菌武器”等网络谣言,意在激发公众愤怒情绪,干扰政府抗疫工作,破坏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第五,为了满足特殊群体自身的经济利益。有些网络谣言的炮制纯粹是某些特殊群体为了满足自身的商业利益,如发布网络谣言说什么可以预防病毒等,其真正用意旨在让公众购买某种商业产品,而网络谣言炮制者则坐收渔翁之利。

## 2.2 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传播的社会心态

网络谣言是通过人来传播的,只有当人们从心里认同了谣言的可信性,才会去传播它。可以说,谣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是社会心态的集中反映,映射出某个时期社会大众的心理状况。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非常惊人,它映射出重大疫情下焦虑、恐慌的社会心态。

第一,对疫情的恐慌情绪。有学者已经证明:心理不安易引起谣言的传播<sup>[62]</sup>。人在遇到危险或不确定性事件时容易产生焦虑和恐惧心理。因此,当重大疫情暴发时,人们听到媒体报道说此次疫情传播速度快、感染率高、致死率高等,便本能地产生焦虑和恐惧心理。官方媒体在重大疫情暴发初期采取的有选择性的新闻报道原则,其本意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实际上却加重了公众对疫情的各种猜测和担忧,由此产生了更强的恐慌情绪。对疫情的恐慌情绪降低了人们对信息的分辨能力,从而加快了对网络谣言的传播。

第二,网民群体的从众心理。批判力是影响网络谣言传播的重要因素。网络谣言受者的批判能力越高,网络谣言的传播强度就越低。罗斯诺认为:“流言的传播是发挥集体性批判能力以解决问题的交际行为。”<sup>[64]</sup>但目前,由于各种原因所致,我国网民的批判能力还不是很强,此次疫情中网络谣言的传播也有力证明了我国网民的从众心理比较严重。疫情中,大部分网络谣言都是通过微信社交群进行传播的,这多缘于网民对本身所在的社群有着较强的信任感,为了融入这个集体,当看到群里的人都在传播或讨论某一信息,绝大部分人便会在缺乏思考和分辨的情况下加入讨论或再次传播,导致网络谣言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大。

第三,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心理。目前,社会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一些地方政府因害怕追责等原因,往往对其管辖范围内所发生的负面事件进行信息管控,导致公众对其产生不信任心理。因此,疫情期间即使有些在微信群中传播的网络信息已经被地方政府辟谣,但一些人依然持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加强自我防范,并传播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 3 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

鉴于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生成的心理机制,我们从中可以探究到其有效治理途径,即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提高网络新闻舆论的有效性;加大网络谣言粉碎机的辟谣力度;加强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

### 3.1 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是指地方政府取信于社会公众的能力,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

度。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根基,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是靠平时日积月累的。如果地方政府平时能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当重大疫情暴发时,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重大疫情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利益,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把握好机会,也是一次提高人民群众对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大好时机。第一,地方政府要坚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sup>[7]</sup>的工作理念。对于病毒感染者,地方政府要坚持“应收尽收”原则,全力做好救治工作。第二,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先锋的作用。“干部政治上过不过硬,就要看关键时刻靠不靠得住。”<sup>[8]</sup>疫情期间,广大党员干部更要发挥我们党的传统优势,豁得出来、冲得上去、迎难而上,以“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政治自觉,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冲在抗疫战争的最前线。第三,“要紧紧依靠人民,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sup>[8]</sup>。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疫情防控时,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广泛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强大力量。

### 3.2 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十八大报告提出,新时代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sup>[9]638</sup>。社会心态是指人们对于自身及社会现实所持有的较为普遍的社会态度、情绪情感体验及意向等心理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心态直接影响社会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sup>[10]</sup>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是现代文明的要求和体现,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疫情期间,保持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能够提高人们对网络信息的分辨能力,减少和阻止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2020年在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民众的社会心态发生了变化。从民众的情绪反应来看,最普遍的情绪体验是担忧,其次是恐惧、愤怒、悲伤和恐慌,积极情绪体验较少,对疫情感到乐观的只有21.6%,感到平静的只有14.2%;从疫情信息透明度方面来看,51.4%的民众认为疫情信息公开比较滞后或非常滞后。<sup>[11]</sup>这种以负面情绪占主导的社会心态加速了网络谣言的传播。

但是,社会心态与人的心态一样,是可以引导和调节的。疫情期间,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引导和调节民众的社会心态:其一,广泛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提高人们的自我防护能力,降低恐慌情绪。此次疫情中,党和政府在疫情防控的科普方面可以说做得比较成功。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频繁地邀请权威医学专家,通过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民众进行关于病毒产生、传播、防护知识的科普,提高人们对病毒的认识能力和自我防护能力,使社会心态由消极情绪体验明显向积极情绪体验转变。其二,深入宣传党中央疫情防控决策部署,深入报道各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的好做法、好经验,增强民众的抗疫信心。疫情发生后,人们会本能地产生焦虑和恐惧心理。“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疫情防控战略策略、工作部署,能够指导取得疫情防控的重大胜利,需要做好网络宣传工作,让公众知晓,从而降低人们的焦虑和紧张情绪,增强抗疫信心。其三,加强群众心理疏导和干预,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民众的心理建设,并多次提出要加强民众尤其是重点人群的心理疏导和干预。各级地方政府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引导全社会关心关爱确诊人员、隔离人员和病人家属,组织专业、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团队为医护人员、疫情重灾区的群众以及一线抗疫的其他工作人员、青少年群体等重点人群进行免费心理辅导,倡导心理学专家、从业人员及组织免费为网民提供关于疫情期间如何调整心态的网络文章,提高人们的心理素质,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 3.3 提高网络新闻舆论的有效性

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sup>[12]</sup>。这里所指的新闻舆论工作主要是指官方媒体的新闻舆论工作。提高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的目的是增强人民群众对官方媒体的信任,减少打听和传播小道消息。

官方新闻媒体的主要职责就是发挥好党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作用。沟通机制顺畅了,网络谣言自然就减少了。提高官方网络新闻舆论的有效性,必须做好这两点:其一,官方新闻媒体工作者要深入一



线,全面真实报道抗疫工作。全面是指官方新闻媒体工作者既要报道抗疫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感人事迹,也要报道抗疫过程中失职、不作为、违反防控纪律和要求的不良行为。官方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也是重要舆论监督途径。真实是新闻的基本要求,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这一要求显得更加重要。新闻工作者只有勇敢地深入抗疫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提供真实的新闻素材。其二,官方新闻媒体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有效影响国际舆论。一直以来,主要西方国家媒体强势控制和影响着国际舆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道路始终存在偏见。每当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西方一些别有用心媒体总是会炮制出各种各样的网络谣言,蛊惑人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亦是如此。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国更要加强国际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有效影响国际舆论。其中,最好的途径便是“讲好中国的抗疫故事”,把中国人民抗疫的真实故事和迎难而上的中国精神讲好、讲精彩,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国力量寓于其中,把陈情和说理相结合,把自己讲和通过受到正面影响的海外朋友讲相结合。

### 3.4 加大网络谣言粉碎机的辟谣力度

网络谣言粉碎机是指网络信息平台收集网络谣言信息,揭示谣传信息的事情真相,达到辟谣的目的。疫情期间,网络谣言以假乱真,加上人们的恐慌心理降低了自身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致使他(她)们无法辨别一些网络信息的真伪。这时,只有专业、权威的信息才能击溃那些似是而非的伪科学知识。网络谣言粉碎机正是通过吸纳来自医疗、生物、传播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发动各类“知道分子”广泛参与,成立一个多部门联动、专业权威的辟谣团队,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拆穿网络谣言的漏洞,帮助人们看清事情的真相。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粉碎机为辟谣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健康传播紧急战队科普辟谣组,与腾讯较真平台协同对疫情期间的健康类谣言进行实时联动辟谣,疫情发生后至2020年3月16日,已经累计为超过2.98亿人提供了辟谣服务,共计产出内容487篇。<sup>[12]</sup>对于热点谣言话题,为了传播正确科普观点,使辟谣和科普相结合,委员会科普团队通过公众号发文、录制小视频等多种形式在多个传播平台进行科普辟谣,其中科普文章日均达200余篇,日传播量约为2亿次。权威辟谣和防护科普类视频共计6000余条,总播放量达100多亿次。<sup>[13]</sup>除此以外,中国互联网络联合辟谣平台、千龙网发布的北京辟谣平台、丁香医生、A2N民间组织、澎湃号的网信双桥等网络信息平台,也为网络辟谣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粉碎机多多益善,可以使那些不怀好意的“网络谣言”在更专业、更科学的信息面前无从遁形,从而有效阻止其进一步传播与扩散。

### 3.5 加强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

所谓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是指将网络谣言的生产和传播行为纳入网络相关法律法规之中,对生产和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主体进行相关法律处置。加强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对于网络谣言的发布和传播可以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加强网络谣言法治化治理,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对网络谣言进行概念清晰的法律界定。目前,中西方国家均未对网络谣言进行具体的、专门的法律界定。西方国家司法认定谣言的核心要素在于“未经证实”,中国法学界对于谣言的主要争议在“虚假信息”的认知上。<sup>[14]</sup>但这些界定都不十分全面准确,容易引起歧义。对于网络谣言的准确界定,前文已经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其二,加强网络信息“把关”制度,防止网络谣言的产生。首先,对网络信息发布者采取“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原则的“实名制”制度,从心理层面加强网络信息发布者的自我约束,使其不敢任性妄为。其次,加强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对网络信息内容的管理和监督。

其三,设置相关的处置机制。对于已经产生的网络谣言,相关部门需根据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设置经济的、法律的相关处置机制,并严格执行,使网络信息生产和传播主体产生敬畏心理,不敢随意发布和传播网络谣言。

## 4 结束语

目前,虽然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的疫情还未得到有效控制。只要疫情不退,网络谣言也总会此起彼伏。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均有重大影响,而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因

此,对于重大疫情环境下网络谣言的治理要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两方面同时入手。从国内来说,通过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提高官方新闻舆论有效性等举措,使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信任党、支持党、拥护党;从国际来说,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让全世界能听得见中国的声音,认识 and 了解全面而真实的中国。

### 参考文献:

- [1]疫情防控面对面:舆情态势攀升趋缓[EB/OL].(2020-02-06)[2020-10-31].<http://m2.people.cn/r/MV8xXzMxNTczOTQ5XzIwO-TA0M18xNTgwOTUzODQ5>.
- [2]敬菊华,胡卫喜.媒体融合视域下网络谣言治理对策探析[J].社会科学动态,2018(11):39-42.
- [3]人民日报钟声:不容“阴谋论”等政治病毒作乱[EB/OL].(2020-02-28)[2020-11-0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9733466272830450>.
- [4]益阳“武汉大学回来的学生传给爷爷,已造成790人接触”?不实信息编造者向公众道歉[EB/OL].(2020-03-03)[2020-11-0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9388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93881).
- [5]最高法发文说明8名网络造谣者公布散布谣言制裁标准[EB/OL].(2020-07-10)[2020-11-04].<http://www.mylegist.com/zhishi/37282.html>.
- [6]R·L 罗斯诺, G·A 费思, 流言[M].唐辉,李华,钱孟珊,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
- [7]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法治保障[EB/OL].(2020-02-05)[2020-11-05].<http://news.cctv.com/2020/02/05/ARTIC0GzGoUjeAQbIvWkQRek200205.shtml>.
- [8]习近平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4(2).
- [9]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0]王晶熊.如何培养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N].人民日报,2013-04-10(7).
- [11]王俊秀,高文珺,陈满琪,等.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基于2020年1月24日-25日的调查数据分析[J].国家治理周刊,2020(2):55-64.
- [12]疫情期间健康类谣言榜单来了[EB/OL].(2020-03-29)[2020-11-0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5311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753119).
- [13]徐萍,付兵.网络谣言的传播机理与治理途径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12-118.

(责任编辑:范可旭)

##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Treatment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et Rumors in a Major Epidemic

LING Juan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ternet rumors lie in a black zone in the field of Internet thought and an important governance object in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in 2020, various online rumors continued, which brought about serious interference and challenges to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s anti-epidemic work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 major epidemic,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ernet rumors are usually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Internet technology,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classification, synthesis and analysis are applied to conduct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online rumors generated under major epide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so as to find effective ways to manage online rumors, which is of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iting people to fight the epidemic and safeguard st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Key words:** Internet rumors; social harm;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governance countermeasures